



云 / 南 / 大 / 学 / 公 / 共 / 管 / 理 / 研 / 究 / 丛 / 书

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

——从近代政党与国家建设关系的视角

SUNZHONGSHAN ZHENGDANG SIXIANG YANJIU

——CONG JINDAI ZHENGDANG YU GUOJIA JIANSHE GUANXI DE SHIJIAO

邵 宇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 / 南 / 大 / 学 / 公 / 共 / 管 / 理 / 研 / 究 / 丛 / 书

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

——从近代政党与国家建设关系的视角

SUNZHONGSHAN ZHENGDANG SIXIANG YANJIU

—— CONG JINDAI ZHENGDANG YU GUOJIA JIANSHE GUANXI DE SHIJIAO

邵 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从近代政党与国家建设关系的
视角/邵宇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81112 - 945 - 8

I. 孙… II. 邵… III. 孙中山 (1866 ~ 1925) —政党—
思想评论 IV. D69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0346 号

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

——从近代政党与国家建设关系的视角

邵宇 著

策划编辑	张丽华
责任编辑	张丽华 李 红
封面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43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945 - 8
定 价	35.00 元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http://www.ynup.com>

E - mail：market@ynup.com

总 序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西方,由于经济滞胀和政府失败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这场政府改革运动随之在世界范围展开,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以特有的方式走向深入。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这场政府改革运动与传统上的政府改革最大的不同,不仅仅在于基于现实条件下更加深入地认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定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即解决政府干什么的问题,更在于在行政职能的输出方式,即政府的行政方式上进行探索,着重解决政府如何干的问题。这一场政府改革中解决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职能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整个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重大突破,其基本逻辑是在强调政府管理的目标与价值的基础上,加强对公共产品属性认识,确认了私人 and 市场参与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的必要与可能,进而创新了政府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在现实中整合社会资源以满足公共需求,^①从而回应了公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传统的政府难以应对的问题,即政府机构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政府存在的基本要求,就是处置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就是公共管理模式,它由公共管理过程中各公共产品提供者功能的定位、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在人类已有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主要出现过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以政府为主并有限投入的公共管理保护模式、政府全面负责乃至完全垄断的干预模式,政府与

^① 崔运武:《当代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与政府责任》,载《思想战线》2005 年第 1 期。

社会和市场合作的市场模式。^① 因此,公共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或可供选择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分工方式。无疑,自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干预为起点和标志,随着行政国家的出现,在政府作为公共事务主要甚至是唯一管理者的情况下,现实的公共管理模式就是典型的干预模式或垄断模式。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实政府管理的变革,现实的结果就是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出现和成长。^② 正是在这一现实变革的基础上,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尽管人们对当前是否已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现实变革的推动和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迅猛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基于对范式的深入的理解,认为即便不提公共管理已是一个新的理论或学科,但至少已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部规定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以及近期社会科学研究及管理部門的及时调整,也足以说明。

在当代中国,自1993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展开以来,可以说正是得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已成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概言之,这一客观进程的内在逻辑是: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导致了公共需求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正是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使作为公共管理模式从干预走向市场的重要因素——以民间组织或非盈利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社会(公民社会),在相当程度上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而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地认识了当代中国的公共需求的发展变化,把握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提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来确定政府职能,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方针和政策,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努力提高干部和公务员的现代公共管理素质,建立一个既与当代公共管理发展总体趋势相一致,又符合中国特点的新型公共管理体制。一句话,当今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正如同当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实践上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或说公共管理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

① 郎佩娟:《公共模式研究》,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崔运武著:《公共事业管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进行重大变革，进而形成“新公共管理理论”一样，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作为一种在中国出现的客观现实，一种在中国未曾有过新的公共管理实践，它能够对这一实践作出解释并作出进一步改革导引的理论的构建提出了要求。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公共管理研究已成为一个理论热点，一个正在探索的理论面向现实的重要领域。

二

在当代中国，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索，我们认为基本目标有二：

第一，总结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变革和理论发展。具体言之，即审视当代世纪范围内，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政府管理改革先行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研究其新公共管理理论之所以产生的动因、理论发展的脉落，如从管理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再到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内在的发展逻辑与现实影响因素。在把握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踪理论发展前沿的基础上，探求公共管理中具有普适性的因素，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促进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变革及理论的发展。

第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能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有解释、说明和预测的公共管理理论。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是对当代中国公共事务进行协调和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的，是公共管理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管理模式。因此，对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和研究，归根到底，就是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尤其是要通过这一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而持续地增长、社会稳定、民主进步、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公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一“中国模式”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公共管理作出有价值的参考的预测。

如何展开这一探索，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最基本的就是要基于学科综合的基础上来进行。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正如人们所公认的当代正在成长的公共管理理论，它的关注焦点由“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结果与绩效的研究，从而使战略管理、管理的政治环境、项目执行、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及公共管理伦理成为核心问题；它倡导的管理理念，其中心问题——“如何提供公共

利益和服务”，它提供的一整套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则十分注重在处理公共管理问题，尤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关系时，提供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一种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则是由于它的知识基础，即公共管理学作为一种广泛和综合的知识框架，把当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研究中。因此，要追踪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知识，尤其是要建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必须走一条基于以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不局限于政府，以公共行政学为基本视野，但又必须同时关注相关学科，即基于以公共事务管理为核心，基于公共管理又必须逸出公共管理，逸出公共管理又必须回归公共管理的多学科研究路径。

三

云南大学在国内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索者的行列中，不是先行者，但肯定是一个积极的、孜孜不倦的参与者。

云南大学有较悠久的历史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传统。1923年云南大学正式建立后，即于1925年建立了政治学系，展开了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大学政治学和行政学走过和其他兄弟院校一样的历程。改革开放后，云南大学迅速恢复了政治学学科，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办了少数民族干部行政管理大专班。这一行政管理干部大专班沿至20世纪90年代末，在为云南省培养了大批合格的素质不断提高的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干部的同时，也促进着我们对行政管理理论和教学的探索。1986年，云南大学获得了政治学理论硕士授权，即在这一专业中根据当时学科划分的要求，开设了行政学方向，培养行政管理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随着国家进行学科专业调整，明确地建立行政管理专业后，云南大学先后获得了行政管理的本科专业和硕士点，开展了行政管理的专业教育。

1999年，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使正在成长的公共管理学科，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针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把握时代的脉搏以及公共管理这一高度整合的新兴学科必将成为社科领域的一个显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的巨大需求，云南大学依托学校既有的相关学科优势资源，以原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为基础，于1999年7月正式建立了公共管理学院，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也得以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公共管理学院，从而使我们对公共

管理理论进行追踪关注,对新型的具有公共管理理念、掌握当代公共管理技术和方法的多学科的交叉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培养,有了坚实的学科平台和新的人才培养条件。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建立后,我们积极追踪公共管理理论,展开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我们的建设战略,一是以行政管理学科建设为基本支撑,二是积极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科学研究与教学研究相结合。这样,“九五”期间,行政管理学科被列为云南省重点建设学科。在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支持下,我们行政管理重点学科建设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获得了一大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教育部青年教师奖基金、国家新世纪重大教改项目等,支撑了整个学科建设,使学科力量不断得到发展,于2003年获得了MPA教育授权,2005年获得了行政管理博士授权,并建立了省部共建的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十一五”伊始,得益于正在深入发展的改革现实对公共管理的需求,基于我们从“九五”开始的以行政管理为基础的学科建设,以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为目标——一个以公共管理为核心,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更加综合的学科整合的建设,即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建设学科,使我们对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和探索,有了新的、更高的平台。我们基于公共管理的学科特点和基本内涵,确定了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共事业管理、公共政策与地方政府治理、公共经济与政府理财、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与管理、电子政务五个建设方向,同时,也从更宽广的视野或学科入手,依赖于以往建设的基本路径,展开了新的积极的探索。

为了记录和展现我们探索的结果,我们编辑了“云南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丛书”。当然,尽管当今世界已是一个信息社会,资讯的传递和使用已非传统社会可比,但由于原有的学科基础和研究力量以及地域等条件所限,我们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追寻和探索,难免前瞻与后顾并存、深刻与肤浅共融。但我们以为,对在一个诱人的,但实际上又充满艰难、困惑迷宫般的思想殿堂里的探索者而言,或许同样重要的,不仅仅在于所得,还在于有一种为理想而追求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一种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贡献一得之愚而带来的创造的欢乐。

是为序!

崔运武

2010年1月5日于昆明

目 录

导 论	(1)
一、国家建设、革命与政党：理论预设	(1)
二、选题意义	(7)
三、研究综述	(12)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9)
第一章 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困境与孙中山政党思想的萌发	(23)
第一节 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困境：终极精神与社会主导力量的孱弱	(23)
一、国家建设：中国现代化的主题与前提	(23)
二、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困境之一：终极精神的缺失	(26)
三、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困境之二：社会主导力量的孱弱	(29)
第二节 信仰与组织：近代政党的政治应对	(31)
一、信仰与组织：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政治要求	(31)
二、近代政党的政治应对：信仰重塑和组织重建	(38)
第三节 信仰重塑和组织重建：中国近代政党的创建与孙中山政党思想的萌发	(42)
一、现代化的开启与政党产生的推动力	(43)
二、西学东渐与西方政党观念在中国的传播	(46)
三、孙中山政党思想的萌发	(50)
第二章 政党与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孙中山政党观念与建党思想	(55)
第一节 政党在革命与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55)
一、政党与政党类型	(55)

二、政党在革命与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58)
第二节 政党与革命党：孙中山政党观念	(61)
一、“政党”与“革命党”区分的缘起	(61)
二、“政党”与“革命党”：孙中山的政党观念	(63)
三、孙中山的政党观念评述	(67)
第三节 孙中山建党思想	(69)
一、组织性政党：孙中山对近代中国的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政治应对	(69)
二、孙中山建党思想的流变	(72)
第三章 政党与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	(89)
第一节 三民主义：作为革命和国家建设特征的意识形态	(89)
一、作为革命和国家建设特征的政党意识形态	(89)
二、三民主义：孙中山指导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	(94)
第二节 意识形态之一：民族主义	(98)
一、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	(98)
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曲折发展	(101)
三、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	(105)
第三节 意识形态之二：民权主义	(108)
一、自由平等观	(109)
二、五权宪法	(112)
三、直接民权	(115)
第四节 意识形态之三：民生主义	(118)
一、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	(118)
二、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	(127)
第四章 政党与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孙中山政党社会整合思想	(133)
第一节 孙中山政党社会整合与近代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	(133)
一、政党的社会整合与近代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	(133)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群体与孙中山的政党社会整合	(137)
第二节 会党：孙中山政党社会整合的借助力量	(139)
一、会党的群体意识、结构特征及其与早期革命党的结合	(140)
二、孙中山对会党反满思想的借用	(141)
三、会党的加盟及其体制对早期孙中山所建政党的影响	(143)

第三节 华侨：孙中山政党社会整合的海外社会基础	(145)
一、近代华侨群体的形成及其特征	(145)
二、孙中山对华侨群体的组织和动员	(148)
三、华侨群体对孙中山政党活动的作用和影响	(150)
第四节 农民：孙中山政党社会整合的基本力量	(157)
一、农民与近代中国革命：一种基于理论和现实的分析	(157)
二、孙中山早期革命对农民的疏离与民初农民的反党意识	(160)
三、孙中山晚年对农民的动员和组织	(165)
第五章 政党与国家建设的基本途径：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	(169)
第一节 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	(169)
一、以党治国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170)
二、以党治国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石	(175)
第二节 以党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	(182)
一、以党建国	(182)
二、党在国上	(185)
三、主义治国	(188)
四、党统军队	(190)
五、领袖至上	(192)
六、政党政治	(194)
第三节 建国程序论：以党治国的实施方案	(196)
一、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孙中山早期的建国程序论	(196)
二、军政、训政与宪政：孙中山辛亥革命后的建国程序论	(201)
第六章 政党与国家建设的目标：孙中山政党政治思想	(207)
第一节 总统制、内阁制与五院制政体：孙中山政党政治的制度架构	(208)
一、孙中山的总统制政体观	(208)
二、孙中山的内阁制政体观	(215)
三、孙中山的五院制政体观	(222)
第二节 两党制与一党制：孙中山政党政治的基本模式	(227)
一、两党制：民初孙中山政党政治的基本模式	(227)
二、一党制：晚年孙中山政党政治的基本模式	(239)

结 语 先行者有益的探索	(242)
一、孙中山政党思想的主要特点	(242)
二、孙中山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	(249)
主要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271)

导 论

一、国家建设、革命与政党：理论预设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可以划分为逻辑相连的两个阶段：首先是在迎接现代化挑战的背景下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然后再以现代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实现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通过借助政党的革命行动获取国家政权，从而实现国家的重建，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近代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第一个阶段，即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最终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的，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

（一）国家建设的内涵和特征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可以从“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与“革命”这两个方面进行理解，而政党提供了组织化的手段。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国家建设体现在现代化的政治方面。^①

英国学者马歇尔（Marshall）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国家建设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公民资格”的分析，马歇尔认为，公民资格的获得，一方面保护个人免受社会分化和市场扩张的冲击；另一方面使社会不平等合法化，从而维护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共同体的存在。马歇尔认为公民资格的获得需要三种权利的支持：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欧洲中世纪，所有权利都是由公民所在地方共同体的地位决定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共同体开始瓦解，特定的国家组织和机构开始出现并替代了地方性势力的职能。与这三种势力相对应出现了四种公共机构：法庭、代议机关、社会服务机构和学校。这些

① 刘晔：《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机构的建立说明国家社会经济职能的发展以及国家具有调整社会、市场关系的能动性。^①

德国学者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一书中认为，现代国家是社会经济秩序的最高协调器，而国家建设就是国家实现对暴力、税收、土地垄断和独占的过程，其推动力就是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展。在早期欧洲，国王没有足够的税源，因此无法维持其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形成稳定的受中央监控的统治机器。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经济交换的增加，货币和法律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些推动了社会依存关系的发展。而要保证依存关系的稳定，一方面需要控制暴力的情绪；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协调机制。中央政府和国王随着地位的提高，通过战争等方式逐渐垄断了暴力、税收和土地。对暴力的垄断减少了武力的滥用；对税收的垄断为军队和其他协调机构的存在和运行提供了物质保证；对土地的垄断排除了其他竞争者的存在。此后进入了“垄断社会化”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管理的非宫廷化和专业化；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控制权被新兴阶级掌握。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分工的深入，而且反映了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产生了更大的约束力，减少了权力的滥用。

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是传统国家和绝对国家之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民族国家存在于由其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的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行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②可见，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民族国家的控制能力，把重点放在国家建设方面，而不是民族形成方面。这也是把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基本政治单位的原因所在。

国内学者方面，施雪华教授将现代国家分为八大基本类别：（1）民族国家：以一个民族为主体构建的国家；（2）主权国家：具有独立的主权，对外独立自主，对内权威最高；（3）理性国家：公共理性占主导的现代国家，相对于虚假的“公共理性”实为一家一姓的“私人理性”占主导的传统王朝国家；（4）有限国家：公共权力有一定边界和限制的国家；（5）效能国家：追求高效能的国家；（6）民主国家：公民有权参与政治过程的国家；（7）法治国家：依法治国；（8）科层国家：以现代科层制组织国家和政府并治理社会的国家。因此，他认为这八大特征是衡量现代国家的标准，而现代国家建设就是围绕这些特征而展开的。部分国内学者从权力的理性化、文化的世俗化、结

① T. H. Marshall: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reenwood Press, 1963.

②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

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等四个方面对现代国家建设进行界定。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国家建设现象进行了解释,虽观点不尽一致,但对于国家建设的核心内涵的界定却是一致的,即国家建设是一个政治权力不断集中、国家的社会调控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美国学者布莱克较好地归纳和总结了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要特征:一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表现为决策的强化;二是法律规范的普及,同时导致官僚机构发展;三是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扩大。^①

因此,现代国家建设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二是政治民主化。现代民族国家乃是以历史语言文化共同性为基础的民族与政府(国家)结构的结合体。政治民主化和国家建设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由专制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是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种形式。但许多最基本的国家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就已经确立起来,如中央政府或者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一整套国家政治制度。实际上,这个基本的国家制度的建设形成过程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因此,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和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不同形式,在近代民主政治出现之前,现代化建设就已经开始了。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建设首先要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然后再推进政治民主化,也就是说,前者是后者的前提。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可以划分为逻辑相连的两个阶段:首先是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然后再以现代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1840—1949年的中国处于现代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即通过政党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主权独立和政权稳定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现为“以党治国”的历史道路。但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存在着两个方面的政治困境:一是国家建设缺乏一套全社会都能接受的共同信仰;二是国家建设的领导性力量的孱弱。也就是说,政党实现国家建设需要完成两个任务:信仰重塑和组织建设。政党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同时也为国家建设提供了领导力量,并通过政党的组织功能动员社会力量,从而使“以党建国”的道路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 革命:现代国家建设的方式

马克思指出:“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②

① [美] 安东尼·奥洛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9~3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页。

可见,革命对政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而新的国家制度的建立往往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得以实现的。革命是政治体制变革中最典型的一种,它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且通过多种手段使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发生改变。革命可以表现为两种形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政权,改变现存的政治秩序,并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社会革命是以政治力量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本书对革命的理解主要是指政治革命这个层次。政治革命往往是以特定政治事件构成革命的起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而且革命进展的曲折与否以及革命的结果与革命中的“政治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所谓革命中的“政治事件”实际上是指“人际间形成的敌我共存关系是围绕政治权力的敌对关系”^①。从思想根源上看,政治革命“就是使政治暴力变为国民的权利,即反抗权得以正当化”^②。

面对全面的民族危机,从政治改造入手,寻找根本解决的途径便成为近代政治精英的共识。于是他们作为一股强大的反体制力量急剧地涌入政治领域,以争取权力、地位与财富资源。但近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始终充斥着着一股十足的政治浪漫主义气息,即认为政治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种片面夸大政治功能的思潮,表现为对西方政治的误解和对政治全能主义的崇尚,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为走出现代化的困境,从而实现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即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的急迫心情。而晚清以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其政治制度化水平远远不能满足政治参与的要求。亨廷顿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关系的角度分析了革命产生的条件,他认为:“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个象征性或物质性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可实现。向上攀登或期望甚高的集团或不灵活的制度乃是制造革命的原材料。”^③这样,清末社会就潜藏着革命的危机,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精英阶层仍在全能政治观的指引下,通过政治寻求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革命可以说是克服这种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是最有效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的制度与组织。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就是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

① [日] 中野实:《革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② [日] 中野实:《革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

得解放和发展。革命的性质决定新的国家的性质，那么对革命的性质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要考察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即必须考察产生这种新国家制度的具体革命过程，从而深刻地把握这种新国家制度背后的历史与社会的规定性。”^①近代中国为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即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完整，不断地通过革命以实现此目标。近代中国通过革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创造了新的国家制度，因此，新的国家制度潜在的、独特的因素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就已经奠定了。

革命可以被理解为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一种政治现代化的方式。亨廷顿指出：“革命是现代化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制度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在政治上，革命的实质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核心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因此，一场全面的革命意味着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制度化。”^②革命作为急剧的政治变革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状态，都会引发阻止或延缓政治发展进程的、具有政治意图的行动，诸如政变、叛乱、分裂、恐怖、权力集中、个人独裁等现象。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政治变革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通过借助政党的革命行动获取国家政权，从而实现国家的重建，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近代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第一个层次，即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最终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的，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

（三）政党：革命与国家建设的组织化力量

政党是近代社会以来阶级、阶层或集团之间，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以国家政治权力为核心而展开活动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组织。政党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是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发展密切相关的，是在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后为发展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形成的。从经济基础上看，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必然在政治上要求民主、自由和平等，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必然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各集团为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必然在政治权力上展开竞争。而这些集团之间，意识形态上的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对立很明显。各集团为自身的利益而纷纷在政治上找到依靠，这就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从政治上看，政党的产生是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的产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了近代资本主义代议制度，议会内的斗争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在代议制民主制下，公民通过自己的代表间接地行使主权，

①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